

丁日昌与容闳教育计划

1872年秋，30名中国幼童作为首批留学生横渡重洋抵达美国，此后连续三年，各派30人赴美留学。“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①这120名留学生的派遣是维新志士容闳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与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的支持分不开的。本文拟就丁日昌与容闳的关系以及他在派遣这批留学生中的作用初步加以探讨。

—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容闳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是他维新救国，实现“西学东渐”理想入手之方，也是他长期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

容闳是我国第一个在美国一流高等学府毕业并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在大学尚未毕业之时，他对于“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他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②这就是容闳著名的教育计划。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美国远比封建的中国优胜，只有按照美国的方式改造中国，中国才能繁荣富强。他坚信，“借西方文明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

^①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等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57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3页。

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维新中国之道，在于输入西方学术；输入西学之方，在于按西方资本主义的面貌造就大批的中国人才，使千百万中国青少年都像他那样精通西方文明，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决心回国劝告清政府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大量派遣留学生，使“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

容闳教育计划的形成是由两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一方面，容闳所受的教育使他崇尚西方文明。从小学到大学，他受的是纯粹的西方教育，英美教师的言传，资本主义文化科学知识的熏陶以及对上升时期美国社会繁荣富强的直接感受，使他崇尚西方文明，向往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容闳深挚的爱国思想使他立志“为祖国尽力”，谋求中国维新富强。尽管容闳接受西方教育，崇尚西方文明，并曾加入美国国籍，但他却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容闳并不想抛弃祖国，逃避现实，也不愿让贫穷落后的祖国一切照旧，而是立志将其所崇尚的西方学术输入中国，使祖国逐步维新，繁荣富强。他把这看成一种神圣的使命，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大事业。

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于1854年冬回国。但是，在此后十多年间，容闳一直没有机会实施他的教育计划。

1863年，经友人介绍，容闳应邀到安庆见到了曾国藩。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是清政府中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正计划在上海筹备江南机器局，需派人赴美采购机器设备，得知容闳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就再三写信罗致。容闳为了取得曾国藩的信任以便实行其教育计划，毅然答应担任这一艰巨的使命。这年冬，容闳启程赴美，第二年购得机器一百数十种返回，这便是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此行博得了曾国藩的好感，专折请奖，保奏五品实官，容闳于是获得了候补同知的资格，月薪250两。就个人地位而言，容闳的努力不无结果。但他的教育计划仍然没有找到实行的头绪。

为什么容闳四处奔走十余年，他的教育计划却总是得不到实现呢？根本原因在于：1855—1865年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计划的社会历史条件，又缺乏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有力人物。那时的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绝大多数官僚仍然不明世界大势，将自己封闭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独立王国之中，抱残守缺，夜郎自大，不晓得中国之外另有天地，他们视学习西方为“以夷变夏”，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至于拜洋人

做老师，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虽然魏源已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当时这只不过是个别先进知识分子寂寞的沉思和孤独的呐喊，既没有付诸实践，又不曾产生明显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容闳教育计划的无法实现就是必然的了。

二

1860年代中期以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平息下去了，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学习西方、师夷制夷的思想开始被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得国家富强的变革思潮，“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成为这一派人的共同主张，这种思潮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兴起。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企业的创办，中外交往的扩大，迫切需要大批掌握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技人员和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外交人员，正是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西学的输入和传播，促使中国人走向世界，从而也为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

洋务运动的兴起使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有了可能性，但是要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获得统治阶级中既有远见又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这类人物，首推江苏巡抚丁日昌。

丁日昌在督办江南制造局时就结识了容闳，以后任上海道又与容闳过从甚密，相交“颇投契”。丁任盐运使时，容亦随之到扬州半年，译出哥尔顿所著《地文学》一书。容闳说他“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称其为“志同道合”的“老友”。

1867年，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于苏州公署谒见了丁，“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在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见之后，丁日昌命容闳“速具详细说帖”，由其寄交文祥转奏。其时文祥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之一。

丁日昌对“教育计划”的重视和支持，使容闳“惊喜交集”，于是“亟亟返沪”，将他的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呈给丁日昌，其中第二则的内容是“政府宜选拔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递派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

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师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条陈言简意明，将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意义、方式方法、年龄年限、学额、管理及经费都一一考虑到了，确实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不料，条陈寄送不久，文祥却因丁忧回籍。丁日昌将此消息函告容闳，后者心意俱灰，怏怏不乐。此后，容闳每次见到丁日昌，总是要提及教育计划，免其日久淡忘。丁日昌由于对派送留学生一事颇为重视，也多次请曾国藩出面玉成此事。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命曾国藩、丁日昌前往查办，丁电召容闳赴津任译员，事将毕时，容闳请丁日昌乘机向曾国藩重提教育事。其实，在津期间丁日昌已屡次同曾国藩商议，“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① 丁日昌还向曾国藩推荐了陈兰彬与容闳，说他们二人可以充任留学生监督带领幼童前往美国。曾国藩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答应立即和李鸿章等联衔入奏，请政府旨准。于是，丁日昌怀着无比急切和喜悦的心情连夜告知容闳。容闳记述说：“一夕，丁抚归甚晚，予已寝。丁就予室，呼予起，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将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

不久，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等人的奏折。1870年冬，容闳被曾国藩召至南京，“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出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随后，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又上奏折，制定了选派留学生章程13条，大略谓，挑选12岁至20岁的幼童120名，分4批，每批30人，按年分送出洋；出洋幼童须身家清白，体质健康，应考合格，并由其父兄具结，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15年内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服装，皆由政府供给；幼童选定后分别注册，不得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籍，学成后亦

^① 宝璠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故宫博物院用抄本，193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611，文海出版社，1971，第7573页。

不准另谋别业，由政府安排差使，由陈兰彬、容闳分别担任留学生正副监督；并带汉文教习和翻译人员，经费年需银6万两，由江海关税项下指拨；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筹办派送留学生一切事宜。从这时起到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学童即起航赴美，此后按年接派，到1875年共派120名12至15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容闳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终于变成了现实。

三

丁日昌赞助促成了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但他推荐陈兰彬任留学生监督却导致这一计划中途夭折，这当然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1870年夏天，丁日昌在天津同曾国藩商议派遣留学生的时候，就建议让陈兰彬和容闳分任留学生正副监督。他还向容闳推荐了陈兰彬，“谓将来可副予（指容闳——引者注）为中国留学生监督”，并对容闳解说：“君所主张，为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可见，丁之荐陈，用心至为良苦。容闳当时就认为丁日昌的主张“盖有深意”，“极佩其思虑周密。”

进士出身的刑部主事陈兰彬，因喜谈洋务受到曾国藩的重视，但足迹未逾国门一步，对世界大势知之不多，抵达美国之后，日益暴露出其封建的顽固习性。他“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以为其一己所受纯洁无暇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①他处处与容闳作对，与留学生为难。他不仅与容闳时有齟齬，而且奏报清廷，诬蔑留学生在美国放荡不轨，讦发容闳将留学生引入歧途，并要求辞去留学生监督职务。

1876年陈兰彬调为驻美公使，又特荐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性情怪僻，顽固卑劣，“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在陈兰彬的暗中指使下，吴对留学生事尤思破坏，不遗余力。上任未久，即胡说“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3页。

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建议“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①由于陈、吴等人的破坏，清廷于1881年将留学生全部撤回，容闳教育计划因此而夭折。

对于陈兰彬、吴子登蓄意破坏留学事业的鬼蜮行径，忠厚温和的容闳经过严酷的现实教训之后，才认识到他们都是“极顽固之旧学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矣”，于是他发出感叹说：“甚矣，知人之难也。”^②

是的，知人而善任是很困难的，丁日昌之荐陈兰彬，本想利用他的翰林资格以对付守旧势力，不让容闳首当其冲，免使其教育计划功败垂成，结果竟适得其反，这一人事安排恰恰导致容闳教育计划的夭折，这种教训是值得后人汲取的。

容闳的教育计划虽然遭到了严重挫折，但这几批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是一件划时代的创举。那时，封建统治阶级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夷夏之辨”仍然是不可逾越的神圣信条，而世俗的偏见一直将做八股文章和科举仕进视为正途。因此，派留学生到遥远的“夷狄蛮人”那里去拜“洋鬼子”为师，学习非科举所需的“声光电化”，不仅要冒着“以夷变夏”、“师敌忘仇”的政治风险，而且要顶着习惯势力的巨大压力。偌大的中国，一年只派30名，并在上海设专局招收，都无法满额，还要到港、澳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中去补充。4年共派120名留学生，70%是广东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毗邻澳门的香山人士。这从反面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内地选派学生出国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他们学期未满而被迫回国，更说明封建势力的可厌与可怕。但是，留学生走出了国门，留学事务所耸立于美国哈特福德之克林街，毕竟成了无法抹掉的事实。它冲击了弥漫于全国的顽固守旧风气，开了我国近代留学运动之先河，容闳把这件事称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是有其道理的。自此以后，出洋留学渐多，1875—1881年沈葆楨、李鸿章等又先后派几批人赴法、德和英国留学，1896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20世纪初赴日留学遂成一种热潮。从总体上看，这属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进步潮流。

其次，这批留学生的派遣增进了中外交往和中美友谊。当清政府诏令留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1、104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2页。

美学生全体归国之时，美国许多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们曾联名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明确指出“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由此可见，封建顽固派对留学事业的种种攻击多属诬蔑不实之词，这批幼童以其良好行为和优秀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大大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我国近代留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第三，这批留学生的派遣为我国培养了人才，他们辍学归国之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① 据有人统计，除了17人早夭，1人不详外，102人留美后的职业分布为：政府官员4人，铁路工程师5人，医生、教师、记者、编辑10人，经商、银行、海关12人，煤矿工程师13人，铁路官员14人，外交人员17人，电报工作17人，海军军官18人（其中少数一人数职，统计时略有重复）。^② 这批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成了中国各方面的重要人才，“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由于亲身经历过中外两种不同的生活与教育，“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这种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使不少留学生成了晚清政治改革与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以上我们考察了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派遣的过程及其意义。从而可以看到，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与洋务运动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的支持，这一计划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而丁日昌与容闳

①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鸿章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67页。

② 参见黄继宗、于醒民：《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派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的友谊以及他的大力赞助，又成为容闳教育计划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条件。容闳自己也总是把主要荣誉归之于上述三人，认为“他们以其权势有力地促成了此举”。他把他们的肖像挂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人敬奉为他们的恩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①。是的，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姓名必然会被人们所铭记，容闳和丁日昌就是这样的人。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人们当然可以在别的问题上加以谴责，但他们在派遣留学生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远见卓识和开拓勇气，后人也是不会忘记的。

（原载《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15页。